

學者背後看不見的壓力

七月底自立晚報連續刊出了兩篇蘇嫻雅記者的訪問稿，一篇是訪問歷史博物館館長陳癸淼先生，一篇是訪問中研院院士、語言學家張琨教授。

陳癸淼因為在國建會建議「我們應有統一的語言，但也不要壓制或消滅方言。」因而「感受到無比的壓力」，但是他仍然呼籲「讓語言歸語言，政治歸政治」。他希望「把閩南語視為像廣東話、上海話一樣，就不會那麼敏感了。」

張琨教授強烈地批評了「語文法草案」，他認為「語言是自然的產物」，「法令絕對無法強制要求某個人說某一種語言、或不說某一種語言，否則將要處以徒刑或槍斃，這是行不通的。」

張琨教授是國內外知名的語言學家，他特別精通於聲韻學及閩語學，是筆者一向尊敬的學者，陳癸淼先生雖不是語言學家，但他曾在大學中講授語言學，可以說兩位學者都有深刻的語言學素養，因此能够以開闊的心胸來對待語言問題。在今天，「方言」——即母語受到強烈壓迫之際，能够站出來說些良心話的學者，毋寧是令人尊敬的。

然而兩位學者並沒有說出「真正的良心話」，從訪問稿的字裏行間，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看不見的「無比的壓力」。

雙語人無法成爲頂尖人物？

兩位教授不約而同地談論了非標準語與標準語之間的關係。他們都承認了非標準語「存在的事實」，反對用強制手段去壓迫非標準語。但是張琨教授又說：

「美國加州有很多地區在法律上有兩種官方語言，墨西哥人多的地方，從小學課本開始就有西班牙和英文兩種語言，許多華語區也一樣，像舊金山連選票都有中文的。在這些地區長大的小孩雖然學會「雙語」，但他們的英文絕對比美國本土的人差，發展因而受到限制，很多華裔無法成爲頂尖人物，就是因爲英文不夠好。因此，以立法方式來推行「雙語」是否正確，也值得商榷」。

張教授的言下之意，似乎語言是一種相尅的東西，精通了某一種語言就不可能再精通另一種語言，學了西班牙文，那麼英文「絕對」比美國本土的人差，因而失去了競爭力，無法成爲頂尖人物。爲了成爲頂尖人物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只學一種語言。在美國只要學英語，在臺灣只學「國語」，那樣才能成爲頂尖人物。

我不知道張琨教授所謂的「頂尖人物」，到底要怎樣頂、怎樣尖才算「頂尖」。在我的心目

中，張琨教授是當今語言學界的頂尖人物，在國內，他是中研院院士，更是學術界的頂尖人物。可是張教授不但中文程度高，英文也棒，他並沒有因為「雙語」教育，使他不能成為頂尖人物。張教授是個知名的語言學家，他不但是苗僑語、梵語、藏語、上古漢語學家，又是閩語學家。可以說，他不只是「雙語」，而且是八、九語，這些語言，不止無法阻止張琨教授成為頂尖人物，反而因為他知道的語言多，因而成為語言學界的頂尖人物。

和張琨教授一起回國參加院士會議的還有楊振寧、丁肇中等拿過諾貝爾獎的院士，他們無疑的也是「頂尖人物」了。這次他們回國，成了電視新聞的焦點，天天有他們的談話，可是講的還是中國話。他們怎麼沒有因為「雙語」教育，阻止他們成為「頂尖人物」呢？

種種事實證明，要成為「頂尖人物」，不但不能只懂一種語言，並且要精通好幾種語言。精通的語言越多，越能開大視野，加深內涵，成為頂尖人物。這個事實，張琨教授一定也知道，却違背良心地把「有一些華裔無法成為頂尖人物」，歸罪於因為雙語教育，而沒有把英文學好。這到底是記者筆誤，還是張教授在無形的政治壓力下，故意顛倒黑白？

頂尖人物豈可數典忘祖

再說，能够成為「頂尖人物」的人，可謂鳳毛麟角，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的，並且也不是人生的唯一價值。

一個人學好他的母語，不止是一種權利，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。楊振寧、丁肇中如果不懂中文，回國以後滿口洋腔洋調，中國人不會以他爲榮，反以爲恥。同樣地，閩南人不會講閩南話，無論他有多大成就，閩南人不會以他爲榮，反以爲恥。客家人、山地人，無不如此。這是中國人傳統不可數典忘祖的思想，我想到世界任何地方也一樣的。

在我的觀念中，語言本身不只是一種傳達意思的工具，他更是一種記載文化的工具。一個民族透過自己的母語，保存了自己的傳統文化，如果這套母語消滅了，那麼整套傳統文化也必然會失傳。

如果不是懷著對母語文化的執著，每個人爲了成爲世界頂尖人物，甘願放棄中文，而以英語爲母語，爲了成爲中國頂尖人物，甘願放棄母語，而以「國語」爲母語，那麼各地母文化由誰去繼承呢？「努力成爲頂尖人物」的功利思想，到底對世界文化是一種貢獻，還是一種摧殘？答案是很明顯的。一個人連自己鄉土的語言文化都不去了解，不去貢獻，無論對中國文化、對世界文化多了解，多有貢獻，總覺得是無根的，虛偽的，不是嗎？

所以，「雙語教育」——母語教育，那不是有利與不利的問題，而是使國民成爲有根的，還是無根的重大文化問題。如果我們因爲母語教育成功，因而保存了母文化，即使因此不能成爲中國的或世界的頂尖人物，我想也是值得的吧？

語言不同是械鬥原因？

陳癸淼先生的談話，從臺灣史實，來證明「語言不同」是臺灣各族械鬥的原因，他說：

「從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九五年這二百一十三年間，臺灣地區共發生了三十八次械鬥，其中閩南人與客家人鬪了九次，閩南人中的漳州人與泉州人之鬪有二十一次，也可以說有三十次械鬥是因爲語言問題而起。……語言問題一旦跟政治或經濟扯上關係，就很容易被激化成流血問題……若當時閩南人與客家人用的是同一種語言，也不會有這種問題發生，頂多是個人利益衝突，不可能被鼓動成團體對團體的械鬥。」

這無疑是對歷史的扭曲。果真沒有語言的差異，個人的問題就不會引起團體的械鬥嗎？陳先生若是能够舉出一個史實，證明有一次械鬥，純粹是因爲語言腔調不同而引起的，那我服了。如果因爲參與械鬥的兩派之間語言腔調有異，便說如果腔調相同，便不會發生械鬥，這真是牛頭不對馬嘴。械鬥是世上任何地方都有的氏族戰爭，近代之所以少發生械鬥，乃是因爲個人主義抬頭，個人能够擺脫氏族集團的拘束，爲了個人利益、個人理念而決定是否參與氏族戰爭的新思想發達的結果。閩粵臺灣盛行械鬥，不但閩客之間鬪，漳泉之間鬪，即使同爲泉州人，晉江人，安溪人，同安人……之間莫不鬪來鬪去，同一縣人，這一村跟那一村，同一村人，這一姓跟那一姓，到處都鬪來鬪去，這些小型的械鬥，都是封建時代的集體主義所引起，不是因爲語言腔調有異

而引起的，而陳先生却把械鬥的原因歸罪於語言不同。

如果語言差異會引起戰爭，那麼世界各國如果統一使用一種語言，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或減少國際戰爭呢？

再說，語言等於是一個民族的姓氏，如果語言不同會引起戰爭，那麼姓氏不同更會引起戰爭。如果語言確實會引起戰爭，因而希望語言統一，那麼是不是也希望大家都不要有姓氏，來個姓氏統一？

這番道理十分淺顯，以陳先生的學識不會不知道，但他却發表了「如果閩南人與客家人用的同一種語言，也不會有這種問題發生」那樣的談話。是記者誤記？還是在陳先生的背後有一個無形的壓力，使陳先生不得不作違心之論呢？

我認為過去在臺灣漢人之間沒有「語言問題」。語言的不同不是問題，語言之所以會成為問題，是因為語言受到壓迫。日據時代，臺灣話（包括閩南、客家、山地話）受到日語（當時亦稱國語）的壓迫，臺灣話乃成為「語言問題」，光復以後，臺灣話再度受到「國語」的壓迫，臺灣話乃又成為「語言問題」。如果政府能够像陳先生所呼籲的，「讓語言歸語言，政治歸政治」，不要再壓迫臺灣話，讓所有臺灣人都能充滿信心與尊嚴地去繼承自己的語言文化，那麼國臺語的不同，如何會成為「語言問題」？現在問題既已發生，被壓迫的一方透過種種管道，包括政治手段，要維護自己的母語文化，是一種正當的反應。所謂「語言歸語言、政治歸政治」這句話，應

該先說給執政的國民黨決策者去聽，叫他們把對語言的壓迫先解除，語言便自然歸語言，政治自然歸政治了。不知陳先生以爲然否？

原載「自由臺灣」第九期。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發行

【附】

語言問題何不順其自然

蘇嫻雅

自從在國建會中主張「我們應有統一的語言，但也不要壓制或消滅方言」之後，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陳癸森（見圖）感受到無比的壓力，部分反對人士對他大加撻伐。他感慨良深地說「語言問題最好不要去挑它，現在有人故意突出閩南語，也有人主張用強烈手段推行國語，兩極化的對立結果，只有爲國家社會帶來不幸。」

從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九五年這二百一十三年間，臺灣地區共發生了三十八次械鬥，其中閩南人與客家人之鬭有九次，閩南人中的漳州人與泉州人之鬭有二十一次，也可以說有三十次械鬥是因爲語言問題而起。自稱是「開明的保守派」的陳癸森，眼見當前已有人將語言問題政治化，基